

五四时期天津青年社团与媒体的性别解析

李 净 昉

(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的特殊时期。五四时期天津青年社团从受媒体关注到主动运用话语权,借助媒体表达了自身变革社会的诉求,并对反帝爱国运动和女权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其社会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社团中的男女成员均具有现代的性别意识,通过媒体从多个层面做出了改革社会性别制度、重塑社会性别文化的努力和尝试,同时融合了不同宗教、民族、阶层的人士对于建立现代国家和性别平等关系的理想。性别关系的变动以及女性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恰恰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互动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的重建。

关键词:五四时期;性别史;天津社团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8)04-0117-08

女性角色的重塑以及性别关系的变动和调整,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这不仅表明女性社会身份发生了转换,而且说明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中,海内外学者不仅多关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情况,较少涉及天津,而且很少采用性别研究视角,考察在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社团及其媒体。实际上,在北方沿海城市天津,五四时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纷纷以组建社团的方式走入公共空间,以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意识、性别文化的调整与重建。这些媒体既反映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性质的社团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也为引导公共舆论、参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重新建构、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笔者拟借助性别研究视角,聚焦在五四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天津青年社团及媒体,以此深化相关研究。

一、女界爱国者的媒体再现

五四时期,在国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交织的时代语境中,女性爱国团体不断涌现。女性通过参加以爱国为主旨的社会运动,打破了宗教、民族、阶层乃至性别等界限,与社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她们与男性

共同讨论、参与公共事务,以女国民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并活跃于公共领域,从而突破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角色的限定。与此同时,女性爱国团体也紧紧把握话语权,通过媒体表达她们对于伸张女权和男女平等的强烈诉求。

1919年5月,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家政专修科学生郭隆真的倡议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并预备通过发行书刊、设立女子职业学校和女子工业品制造厂来组织、动员各界妇女投身社会。活动经费则由会员每月捐助或向社会募捐[1]。女界爱国同志会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主要成员[2](P243),但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天津各界女性、聚集爱国力量,创办者主动联合基督教中西女中、天主教贞淑女学以及由地方士绅创办的普育女中等女校代表,并积极鼓励女教师和家庭妇女参加该团体组织的爱国活动。与此同时,女界爱国同志会还与公教女子救国十人团、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女性宗教团体建立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各项活动,《益世报》密切关注并予以详细报道。开展讲演活动是女界爱国同志会采用的重要宣传方式。讲演地点的选择,反映出该社团成员对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空间的主动争取

收稿日期:2017-11-12

作者简介:李净昉(1981-),女,山西沁源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性别与媒体研究。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性别视野中的报刊与公共舆论研究——以现代中国女子教育为例”(项目编号:52WW1413)。

和利用。除了学校、会馆,天津的宗教场所也成为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集会之地。1919年7月25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天津伊斯兰教东南大寺召开讲演会,约有300人到场。由于该会会长刘清扬以及郭隆真等人本是回族,因此她们的行动和言说本身就具有性别、宗教与民族的多重意义。刘清扬在演讲中,也特别注意采用这样的宣传策略“女学生既系国民,岂容落人之后。鄙人在此实有一事为回族羞,盖平日吾回团结力独坚,何以今日对于国事竟漠然置之?然而来日方长,时犹不晚,急起直追,未尝不可。”[3]刘清扬一方面以国民责任呼吁女性与男性共同承担起救国的神圣职责,争取性别平等;另一方面又希望唤起本宗教与民族人士的认同。

东南大寺原是天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士的集会场所,但是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汉族女性也借助公开集会的契机,得以在此阐发教育救国的主张。例如,天主教贞淑女学的萧秉秀女士就指出中国贫弱的最大原因在于教育不良,若父母皆使其子女就学,则人人能有爱国之思想、救国之观念,而中国之强盛便指日可待。圣功女学的姚品女士、女基督徒钟德贞太太等人也相继发表讲演,阐释各自的思想主张。女界爱国同志会以东南大寺为讲演地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与民族空间中男性主导的格局及其性别隔阂,使女性成为言说的主体,而且把以单一信仰为中心的宗教空间转化为以爱国为主旨的跨宗教、跨民族的公共话语空间。

为了争取与不同社会阶层人士接触和对话的机会,动员家庭妇女走出传统的“私”领域,关心国事、参与社会生活,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了家庭讲演团,以讲演小组的形式走街串巷,入户宣传抵制日货等主张。然而对于众多女学生公开抛头露面的现象,天津人的态度较为复杂,存在着明显差异。有人积极响应她们的号召“今既得诸先生之告诫,吾侪须协力同心抵制日货,宁死不愿见中国灭亡。”[4]有些人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为了免生事端,在女界爱国同志会成员发表讲演期间,特别邀请警察在门口维持秩序,阻止男性入内[5]。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有的人让家庭讲演员吃了闭门羹或给予冷遇,更有甚者,有人对她们的一举一动“任意毁谤”[6]。

面对诸多阻力,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未放弃,而是进一步凝聚共识,并对讲演员的言行加强规范“凡讲演员入各家庭讲演者,均须性情坚忍,遇有质问者,必婉言答之,察其程度之深浅而随时施以适当之言语,令其感动焉。”[4]讲演员们遇到困难时,也不厌其详地说明“本团所以不避艰难沿门劝导者,非为一身计,乃为国家计,今同人等喋喋不休,有扰清听,殊深抱歉。惟

大局如斯,复巢之下,安得完卵,故诸位对于国事亦不可不知。”[5]以此使听众了解家庭讲演团的宗旨和他们的初衷,消除了种种顾虑。

在动员女性投身爱国活动的同时,女界爱国同志会抓住时机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积极为女性争取和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权利。在反帝爱国的主张之外,她们发出了“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母性”等声音[7](P540)。不仅如此,该团体还成立了短期义务平民女校,教授注音字母及编织花边,使女性掌握普通知识,习得谋生能力[8]。《益世报》的报道使读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认识和了解这个团体,也参与建构并强化了女界爱国者的公共形象。

值得称道的是,女界爱国同志会主动与男性合作,彰显出女性力求改变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关系之勇气和魄力。一方面,女界爱国同志会在游行、请愿、讲演等方面与由男学生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9]相配合、呼应;另一方面,女界爱国同志会主办的《醒世周刊》社还与男性主导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北洋大学日刊》《南开日刊》等报社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造成强有力之言论,指导社会监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论机关”[10]。

在媒体的聚焦下,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者,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因其在公共空间的言论和行动异常活跃而备受瞩目,并因为参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其活动而获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1919年6月18日,她们加入天津各界联合会[11],既加强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其他社团的互动,也促进了公共空间由男性主导向两性共建的转变。在保持私人关系的同时,她们也努力扩大社会关系,为女界构建更为宽广的社会网络,甚至由学界扩展至报界、商界、宗教界。在刘清扬等人的极力提倡和争取下,天津女界代表还获得了与男性共同进京请愿的机会,从而使天津女性的政治活动空间从滨海都市走入国家政治的权力中心[12](P138-142)。1919年8月,山东镇守使马良在济南枪杀了三名回族爱国人士,惩办马良的呼声随之而起。刘清扬、郭隆真特地在天津回族聚集的北清真寺前发表演讲,抨击马良。她们还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的男性代表一起进京请愿,声援山东的爱国人士,但是遭到警察厅的逮捕和拘留。尽管警察厅是一个彰显男性政治权力的空间,可是她们无所畏惧,格外注重在此为女性立言。警察厅的常处长与刘清扬同为回族,因此想借机劝她回家,却遭到刘清扬义正辞严的拒绝“我此番是奉母命救国,且男女同为国民,理应与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厅内,我等亦甘心。”见劝说

无效,常处长又将刘清扬的哥哥刘铁庵从天津接来,请他说服妹妹。谁知刘清扬仍然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女界此是初次在社会上做事,绝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们亦在里头。”[13]刘清扬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述,经过《益世报》的再现和传播,达到为女性在青史留名的效果。

共同的爱国、救国经历不仅加深了女性之间的友情,也促进了她们与在爱国运动中结识的男性的相互了解,为跨性别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寻求性别平等者的媒体言说

通过组建和参加团体活动,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爱国经验,又深感两性合作的重要,以及如何更好地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等问题。1919年9月2日,在结束了北京的请愿活动之后,女代表郭隆真、张若名、郑季清、周之廉、李锡锦与男代表周恩来、关锡斌、谌小岑等人乘火车返回天津。经过讨论,众人决定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各选出几位代表,联合组建一个新社团,以更好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这一设想与从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活动归来的天津学生代表的看法也不谋而合[14]。在筹备的过程中,张若名、郭隆真等女性不仅主动提出要将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单一的男性社团改组为男女学生共建的社团[15](P157),而且还要在成员的性别构成上实现男女人数平等。这些主张也得到周恩来、马骏等男性的完全赞成。因此,觉悟社的男女成员各为10人,这在以倡导新文化为宗旨的社团中实为一种创举[16](P34)。考察社员的背景,男社员分别来自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直隶第一师范学校及北洋大学;女社员刘清扬、李峙山、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周之廉、张嗣婧、吴瑞燕则均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或在校生[7](P579),李锡锦是天津中西女中学生[15]。觉悟社征召的第一批社员共8名,也遵循了男女人数相等的约定。

五四时期,当男女社交公开尚在全国各地处于讨论要不要实行以及怎样实行的时候,天津男女青年已率先垂范,实现历史的跨越。毋庸讳言,这一时期在有的城市青年中社交公开之风已然盛行,但主要局限于个人。在天津,觉悟社以社团的形式,不仅实现了男女两性社会公开,而且还实行两性共同办公。他/她们共同编辑出版刊物、讨论公共议题、参加社会活动,产生颠覆传统性别关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建的天津新学联也建立在男女平等及社交公开的基础上。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固守传统礼教者的指责,有些女学生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赞成两个团体的合作[7](P556)。为了消除她们的顾虑,张若名挺身而

出,郑重申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合作是缘于宗旨的接近,有较多的共同点,又产生很多实际的利益;既符合男女互助的精神,又扩大了进化的和奋斗的精神。她明确指出:

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都是作爱国的事,为什么合并呢?有两种利益,就是把许多的精神聚起来,用的人力小,收的效果大,这是第一种利益。又本于男女互助的精神,从前的互助是男对男、女对女,现在要扩大了,这是第二种利益。总之,这个会是本着奋斗的精神、进化的精神,同男女互助的精神作去,与黑暗势力相斗。[12](P636)

在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具有平等、互助等性别关系的爱国团体觉悟社,获得了李大钊的赞赏[7](P590),以及北京社团的关注。于是,1920年,觉悟社邀集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代表,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进行交流。刘清扬主持了座谈会,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发表演说,倡议到会的5个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这些活动加强了京津两地青年知识精英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使走向民间、普及平民教育、组织农工、妇女解放、改造社会[17]等成为他们的理想及其奋斗目标。

在社团建设中,觉悟社以改造学生思想为宗旨,努力遵循“革心”“革新”的精神,实现“自觉”“自决”。女社员们则结合女性的切身体验,倡导女权,呼吁女性觉悟。与其在女界爱国同志会发表的言论相比,她们对女权的要求更加强烈。凭借社团刊物《觉悟》这一话语空间,她们在与男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在承担起唤醒其他女性的使命之后,也对投身女权运动的女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张若名撰写的《“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在批判男权的同时,总结了女性参加社会运动的经验。她发现社会上盛行的“平民主义”不过是男性的平民主义,未曾研究到女性身上,即使有人在言论上提倡女子解放,也并没有具体措施。因此,她主张女子应自主解放,但也注意到解放之路上存在着很多障碍,一是女性本身缺乏高深知识,二是家庭的束缚。这就需要有人愿意充当先锋,以一种革命精神去实现解放。在她眼中,革命并非大逆不道,反而是极平常的事,而且人人应当具有这种争真理的精神。

张若名认为实行女子解放,应做到思想革命。首先,她反驳了传统礼教的维护者以三纲五常来批评男女共同学习、共同工作的言论。针对批评觉悟社“男女岂可这样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言论,张若名指出这些人不过是带着一副假面具说出几句形式上的话来。在她看来,道德是精神表现,不是形式可以约束的。男女

社交公开成功的关键在于奉守良心道德。其次,她反对以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性别差异来限制女性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再次,她勇敢地提出破除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针对以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观念限制女性职业发展的言论,张若名特别指出:

原来男子要想束缚女子,就凭空造出男主外女主内的论调,使女子没职业、没经济权,弄来弄去女子没有一点自主权,男子反过来说,女子没能力,只会掌家务。[14]

张若名将争取女性全体解放视为一场与黑暗势力之间的战争,而拥有可以扮演先锋角色的女性人才是实现解放的重要保证。在五四运动中,虽然天津女性通过自结团体和参加由男性主导的社团获得了参加公共事务的机会,但是身处其中的张若名却获得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大团体作事不及小团体,大团体虚张声势,作不出实事来,因为组织复杂,意见不一致,往往生出阻碍。这时候女子的前途极困难,倘若团体的分子不纯粹,不敢向前走,半途中止也未可知。[14]

为改变这种状况,张若名对争取女权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组建社团的基础上,对成员的资格加以审查。她的切身体验也揭示了要实现群体认同并不容易。在社会运动之中,团体成员并非人人都具有明确的自主意识。一些人只是跟随潮流而动,或者被团体领导者带领参与运动。就参加五四运动的天津女学生而言,许多低年级的学生是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呼喊口号,而她们对“女子解放”以及女权主义的内涵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

张若名承认社交公开是实现女子解放的前提条件,但对于那些以“男女社交公开”为口号、而以“寻夫”“寻妻”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并不赞成。她认为这会导致很多青年无谓的牺牲,甚至逃不出传统家庭的圈套。因此可以承担解放重任的女性,必须具有提携女性的心意和牺牲个人的精神。她甚至主张这些女性抱独身主义,而将女子解放作为终身事业。张若名并不反对她们结婚,而是主张只有女性与男女获得同等的知识和经济能力,才能实现合于人生真义的婚姻结合。不过女子教育、经济独立等问题并非一时可以解决,如果女子先锋把个人的婚姻问题掺入其中,则不易集中精力从事女子解放事业。实事求是地说,在她们所处的时代,所谓合于人生意义的婚姻实现起来确是困难重重:

举眼看现在青年男子所谓时髦的自由结婚,他们真足为社会模范么?我实在不敢相信他。所

谓恋爱完全是无意识的感情冲动,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三种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14]

然而,并不是所有抱独身主义的女性都是张若名所说的女子先锋,只有那些怀有救世精神而且愿意为女子解放在社会作各种带有牺牲性活动的女性才能承担先锋的使命。

除了设定先锋的资格,张若名还指出知识储备也是开展女子解放事业的先决条件。近代以降,社会进化论受到中国知识精英的推崇,成为他们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理论参考。但张若名意识到社会进化的目标是由男性提出的,而他们未能切实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实现家庭改革和教育平等。为此,她提倡女性应该掌握学术方面的知识,并结合女性的切身利益来实现自身解放。由于女子职业的范围过于狭窄,所以只有了解其他工商业知识,才能开创女子经济独立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张若名并不赞成从男女同工入手来实现职业平等。这是因为:

资本家也不许可,女子也不敢实行。在这过渡时代,应当先经过多数的女子单独劳动,然后才能进到男女同地劳动;单独劳动的时候,应先有人组织劳动机关。话说到这里,事实上已经不容易办了;组织劳动机关或者是提倡教育平等,只有同志与知识,如果没有经济的预备,也是无用。所以这些同志的人,应当分一部分人去预备经济,一部分研究知识,彼此“互助”,才能达到多数人解放的目的。[14]

对于张若名所持组织女性单独劳动的观点,郑季清^①则以提倡慈善家、资本家多设女工厂做出具体回应。这一建议实际上是她在总结天津女子教育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

女子由学校毕业后,在社会上能占的地位很少,不过只有少数人充当小学的教员,到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员,就不多见女子了。至于学校校长更多半是男子,他待女教员亦是很可笑的;第一,他是轻看女教员,以为女子素来是和平,对于社会情形,又不甚熟习,处处用欺人手段,不使女教员有权,必让他随着自己的志愿去教育学生,甚至女教员的言语,举动,有的校长都要干涉。虽说是个女教员,待遇无异工仆;并不是群策群力谋教育进步。还有一派办学老朽,满口道德,行起事来,不但自己不向前进,恨不得一般女教员也回转头来,照着《女儿经》上条理行事。[14]

^① 郑季清,又名郑漱六,1897年生于江苏扬州,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觉悟社成员。她曾担任长沙一家纱厂厂长。1948年迁居桂林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62年逝世。

郑季清作为教师的切身体验表明性别隔阂被打破之后,在两性共处的公共空间内,女性仍然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阻碍。除了教师这一新兴职业,女性较难得到更多的谋生机遇,以致一些女教师也不得不与现实妥协,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令郑季清颇为感慨,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反而对男女平等的要求更加强烈,如极力主张改革女子教育,培养女性的谋生能力,增加职业学校;男子学校开放女禁;女性也有充当校长、教员的权利。

与觉悟社的宗旨相呼应,郑季清还从“革心”的角度重申女性应该追求精神独立,既要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也不应该被男性关于道德的论述和表现风月的文学作品所迷惑,因为此类作品不断强化的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角色和女性气质。为此,她向女性发出呼吁:

1. 你不要叫人拿旧风俗束缚你,你要本坦白的心地向真理方面进行!
2. 你不要自弃服从寡断,你要本知情意完全独立!
3. 你不要讲那形式上的美观,抹脂粉求人爱!讲那形式上的爱情,辗转缠绵求人怜!你要本天然的庄严,去革那那附属品玩物的怪招牌!
4. 你不要少见多怪,人云也云。你不要偶像崇拜!你要心地明白,脑筋清楚!
5. 你不要贪安逸,依赖于人,你要耐劳苦,自谋独立! [14]

郑季清认为,女性只有实现精神和经济的完全独立,才能在婚姻中获得真自由、真平等。不过,她对女性提出的一系列“不要”的主张,旨在说明女性个体之间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人格独立、凸显女性的主体性才是关键。尊崇传统者、性格柔弱者、热衷装饰者、追求缠绵爱情者、人云亦云者、安于享乐者……这恰恰显示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内在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可是在郑季清的眼中,女性的这些性格特征却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阻碍,是需要改造和改变的。

张若名、郑季清等人的媒体言说足以表明,她们把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寄托在觉悟社这个新生的团体上。如果说在社会运动中她们的言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特定空间和主题的限制,那么觉悟社及其所办刊物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畅谈理想、表达诉求的话语空间。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她们已预先将自己置于觉悟者的位置,向那些尚未觉悟者施救。虽然这些女性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并存、思想错杂的时代,个人的观念、意识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作为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她们迫不及待地要结成跨性别的团体,自我赋权,通过媒体唤醒他人。

由于觉悟社的讨论多集中于社团内部的青年男女,因此所提出的某些改造天津乃至中国青年的具体主张在实践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事实上,觉悟社成员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自我批评:缺乏统一的目标和具体的措施,社员自身知识不完备、没有持久的精神和实行的能力 [14] (P6)。因此,他们所讨论的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议题都难以兑现 [18] (P6)。即使在社团内部,社员们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他们的知识来源比较广泛,除了《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等新文化报刊,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克鲁鲍特金的《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等也在其阅读范围内 [7] (P553)。他们虽然讨论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想,但对其内涵以及具体实践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对此,刘清扬深有体会:

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共产主义,只知道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了,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们的革命是把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7] (P553)

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个人经历的变化使得觉悟社成员在理解社会 and 选择人生道路等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1920年底,周恩来、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李峙山跟随谌小岑去上海;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和女社友王贞儒任教于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受此影响,觉悟社的团体活动实际上趋于停止。至于社团刊物《觉悟》,也因发表与占领天津的军阀相抵触的言论而被查禁。尽管如此,在周恩来的倡议下,觉悟社又以副刊的形式在《新民意报》上开辟了《觉邮》这个公共舆论空间,取“觉悟社成员的邮箱之意”,作为社员交流思想、发表意见的平台。觉悟社成员之间的通信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个人经历的变化对其思想所产生的某些影响。

身处欧洲,周恩来对婚姻家庭问题亦有了新的认识。1921年1月13日,他在致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指出,被国内知识分子高估的所谓欧美各国的现代家庭也是问题丛生,并不足以标榜为模范:

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耶?在国内时或犹以为欧美家庭究较吾人高出多多,即今日与之接触,方知昔日居尝深思之恐惧,至今日固皆一一实现矣;盛倡家庭学一说者,其谓何? [19] (P72)

根据自己的观察,周恩来对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追捧的欧美家庭模式产生怀疑,从而转向无家庭之理想。他认为爱情固然可贵,却无助于巩固家庭。周

恩来对于西方家庭学说的失望之情,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这也说明在国内和欧洲不同的生活境遇使他重新看待婚姻家庭等问题,其个人理想也随之发生调整或改变。

对身处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女社员而言,空间上的区隔并没有令她们停止争取女权的步伐,恰恰相反,她们继续关注天津女权运动的发展,并且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女权运动经验与天津的实践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思考,并显现出女性的特质与思想的魅力。

五四时期,社会进化论仍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张若名、邓颖超等人的媒体言说也流露出她们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与认同,但与男性将妇女问题纳入通俗社会学[20]的知识系统不同,她们更加注重于社团与媒体的结合,努力打破性别隔阂,倡导男女互助与合作,结合天津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体验,重构性别关系。不过,在国族主义话语的影响下,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合作侧重于救国方面,而对如何从根本上实现性别权力关系的平等,以及两性如何在争取女权的问题上具体合作等尚未提出明确的方案。

三、女权运动者的媒体省思

鉴于女子参政运动受到反帝爱国运动的遮蔽,难以达到恢复女权、争取女权的目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自治会发起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并在浙江、上海、南京、山东等地广泛设立支部,联络全国热心女权运动的人士,竖起女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等大旗。女权运动同盟会宣称,女界一方面应该参加争取民主、反抗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更不能忽略自身的特殊责任——女权运动。既然一切反抗强权的运动都是革命运动,那么女权运动也是一种革命运动。只有两性都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21](P84-90)。

1922年,邓颖超回到天津,在达仁女学执教。她与王贞儒通过参加女权请愿团,深切感受到女权运动的开展需要得到更坚固的组织基础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女权运动同盟会的成立,则为她们进一步伸张女权、调整性别关系提供了契机。由于她们多年从事女权运动的经验以及与社会各界人士的紧密联系,在天津等地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北京总部委托邓颖超等人负责筹备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以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为宗旨[22],要求在教育、职业、政治、法律等领域全面实现男女平等:(一)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二)女子与男子,平等享有宪法上人民的权利;(三)私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行为权等一律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四)制定男女平等之婚姻法;(五)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龄”及“纳妾者以

重婚论”之规定;(六)禁止公娼,禁止买卖婢女,禁止妇女缠足;(七)依同工同酬及保护女性之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

为了扩大社团规模,该会对会员资格的限定较为宽松:凡女界年满十岁以上及赞成本会宗旨者皆得入会。除广泛吸纳女性入会,邓颖超等人还采取了调整会员性别结构的策略,既不赞成女性与男性处于对立状态,又积极寻求男性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她们取消了性别限制,广泛邀请天津热心倡行女权、富有研究经验的人士担任赞助员[23]。此举得到了广泛响应,除了男女教员,天津《大公报》编辑翁湛之、劝学所所长华泽沅、县视学邓庆澜等人也纷纷复函,明确表示愿意尽力。《新民意报》社的时子周、孟震侯、刘铁庵甚至表态“不但我们愿作贵会的赞助员,就是我们几个人所组织的《新民意报》,也愿作贵会的勇先锋,但望贵会诸同志,有进无退。我们几个人,很愿永远作你们的助手。”

1922年10月26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会员、赞助员及来宾有450余人,选出职员76人。其组织形式采用委员制,分评议、总务、宣传及经济委员会四部。总务委员会下设庶务、文书、交际三股。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讲演两股[25](P134),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大会上,天津学界、报界、宗教界的男性赞助员希望女性以和平、谦卑、稳健、忍耐的行为争取女权。作为邓颖超等人的老师,马千里诚恳劝说她们:一方面要得家庭中之同情,另一方面还要得社会上的援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雍剑秋在天津成立了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养真社,因此期待女权运动同盟会能从反对纳妾、废除娼妓等方面对改良家庭有所贡献,并且提醒会员注重道德,以建立完美的家庭[24]。由此可见,具有不同主体身份的男性赞助员对于女性社团充满期待,也夹杂着他们自身变革社会的种种思考。在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成员看来,国会制宪的时机不能错过,因此向国会请愿、争取女性在法律上的权利和地位,才是当时最为急迫的事情。然而,就现实的政治环境而论,由于政局动荡,国会和各省省宪缺乏稳固的基础。当政权解体,女性争取法律及政治权利的希望也随之幻灭[26](P210)。

除此之外,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在家庭改革方面也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羁绊。就在邓颖超等人为争取女性的国民权利而努力的时候,会员张嗣婧却受困于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付出惨痛的代价。张嗣婧在觉悟社中的代号是37,后化名为“衫弃”。她是直隶徐水县人,3岁丧父,家中有两姊一兄。她自幼跟随

祖母、母亲生活 9 岁入徐水县女子小学。经其表姐刘兰如介绍,母亲和兄长代她与刘家长子刘庚勋订婚。在张嗣婧 12 岁那年,虽然母亲希望她能继续求学,但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在供给其兄长及未婚妻读书之后,已无力资助她。恰巧刘父在津做事,愿意接张嗣婧来天津求学,并允诺其学费由婆家供给。1915 年,张嗣婧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奋发学习,学业成绩多列于最优秀。但在她读二年级时,未婚夫刘庚勋得了羊角疯,而她的母亲仍然承认之前所订婚约,没有为之退婚。她本人也未能反抗。

与其私人的婚姻家庭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嗣婧与邓颖超等人一同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加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觉悟社、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不顾刘家的反对,在历次游行、请愿、演讲等社会活动中表现极为活跃。然而,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张嗣婧性别意识却很保守,男女平等的观念缺乏。1920 年,就在张嗣婧即将毕业的时候,刘家提出迎娶的要求。她虽然并不情愿,但是不忍违背母意,遂嫁入刘家。婚后,她一边继续求学,一边开始侍奉翁姑。在经济方面,她上学的费用实际多由娘家承担。毕业后,她先到北京担任小学教员,但半年后因夫家催迫而返津,之后在家馆教书,以薪酬自给。1921 年冬,张嗣婧生下一女。婆婆不但在其分娩前后不予照顾,而且对未得男嗣极为不满。此后,张嗣婧又生下一子。婆婆对孙子极为呵护,对她却毫不关心。丈夫也很少承担、分担家庭责任。张嗣婧一方面要在家养育儿女、伺候翁姑、承担家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出外教书来维持生活。身体的劳累和精神的苦闷导致她的病情日益严重,1923 年,张嗣婧不幸去世,年仅 21 岁[27]。

张嗣婧的离去,在天津的女权运动者中引发了关于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讨论。人们难以相信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女性竟未能从个人不幸的婚姻之中解脱出来。在悲痛之余,邓颖超等人通过为张嗣婧召开追悼会,全面审视女权运动的处境,并对女性自身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深刻剖析。于是,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她们批判的主要目标。首先,李峙山指出导致张嗣婧悲剧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传统婚制下翁姑与儿媳的关系。她认为这种关系没有以血统和感情为基础,是非自然的、强迫的。如果女性认可这种关系,“就是承认永远被男性征服,就是承认永远是男子的俘虏品,就是承认为男子全家的奴隶”[27]。在邓颖超看来,正是因为张嗣婧意志薄弱、向环境屈服,才导致悲剧的发生[28]。由此,她们还联想到和张嗣婧同病相怜的女性。于是,觉悟社社员李廉祺进一步指出,她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不会用科学方法,权衡关系的轻重,以定反抗的方针”[29]。

由此可见,张嗣婧的私人生活在公共空间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性别意义。

虽然张嗣婧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论不多,但她在五四运动时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女权运动及其一系列社团活动的过程中已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为青年。面对婚姻、家庭的不幸,她所留下的只言片语借助胞兄张嗣贤之口,传达给亲临追悼会现场的来宾:“我一定慢慢的等机会,非稍达我的初志不可!”这足以显示出张嗣婧并不缺乏坚韧的意志,同时也透露出一个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运动者的忍辱负重和牺牲精神:

我的事情就这样办吧,不要因为我又使母亲添愁,况且在这过渡时代的人,只能为社会造将来的幸福,那(哪)能享现成的幸福呢!我去受了些痛苦,倒不要紧,但愿以后我能在社会上尽点义务,也就甘心了![29]

由此看来,张嗣婧是把自身的出路寄托于变革社会的理想之中,并且通过加入社团、投身社会运动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遗憾的是,在天津女性社团迅速发展的时候,张嗣婧却没有选择借助群体的力量来渡过个人生活中的难关、伸张女性的权利。

五四时期,为了凸显个人自由、独立的主题,许多知识精英提倡打破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但是对于如何帮助女性摆脱困境、改变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并未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案。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看,女性在家庭中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也并不是社会制度压迫论能完全解释的。张嗣婧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她得到刘家打算迎娶的消息时,母亲正在病中,母女之间的深厚感情使她做出了接受包办婚姻的无奈选择。她的遭遇也表明男女平权之路异常艰难曲折,为了争取女权,女性有时不得不对传统做出妥协、让步,却又付出无可挽回的生命代价。

四、结语

五四时期,在共同的时代语境下,天津青年社团通过媒体从多个层面做出了重塑女性角色、调整性别关系的努力和尝试。特别是具有不同背景的女性个体聚合为群体,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和活动平台,在天津的五四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媒体所反映的天津青年社团的主张和实践,反映了不同宗教、民族、阶层的人士对于现代国家和性别关系的想象。对活跃在公共空间、引领女权运动的女性而言,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相互合作的民主社会,是她们的共同诉求。然而,她们争取女权的实践因政局的动荡和传统性别观念的根深蒂固而屡遭挫折。国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交织一方面为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机遇,另一方面却导致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议题一

再被搁置。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一些女性虽然在社会活动中有所作为,但未能于私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获得应有的权利保障。由此可见,性别关系的重构既离不开女性的自觉,也需要男性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体认女性的处境,进而通过两性共建与合作的方式加以实现。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性别关系的变动以及女性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恰恰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互动,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的重建。

参 考 文 献

- [1]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N].大公报,1919-05-24.
- [2]白眉.五四运动在天津[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3]爱国同志会演讲纪略[N].益世报,1919-07-26.
- [4]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家庭讲演[N].益世报,1919-06-26.
- [5]女界讲演员家庭讲演情形[N].益世报,1919-07-03.
- [6]南开日刊[N].1919-07-05.
-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8]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平民女校[N].益世报,1919-11-07.
- [9]学生联合会开成立大会[N].益世报,1919-05-16.
- [10]学生报社之联合[N].益世报,1919-08-10.
- [11]天津各界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N].益世报,1919-06-19.
- [12]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 [13]请愿代表刘清扬坚贞不屈[N].益世报,1919-08-29.
- [14]三个半月的“觉悟”社[N].觉悟,第一期,1920-01.
- [15]谌小岑.觉悟社及其成员[A].天津文史资料选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5).
- [16]黄嫣梨.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M].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7.
- [17]改造联合宣言[J].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11.
- [18]刘清扬.有关天津五四运动和觉悟社的一些情况[A].天津文史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19]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20]白露.有所需求:1920年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女性[A].游鉴明,罗梅君,史明.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C].台北:左岸文化,2007.
- [21]刘蜀言.女权运动同盟会[A].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的社团(第二辑)[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 [22]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简章[N].益世报,1922-10-30.
- [23]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N].1923-03-12.
- [24]赞助女权同盟会之覆函[N].益报,1922-11-20.
- [25]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 [26]陈三井.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
- [27]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N],1923-05-27.
- [28]宣言——为衫弃的死[N].觉邮,1923-04-06.
- [29]追悼会上李廉祺之演说[N].女星,1923-06-06.

(责任编辑 陈朝云)

On the Industrial Expansion of Foreign Business in China and Its Effects before th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HE Lan – ping; WANG Lei

(*School of Marxist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Shanghai 201203*)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industry originated from the passive opening of foreign industries. Before the Sino – Japanese War of 1894 ,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industri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 the first expanding stage and the second expanding stag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foreign industries in modern China mainly relied on its inherent advantages of " preemptive " , " local support " and "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 , which had taken the lead in time , industries , capital , technology , talents , management and systems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ecause of these three major advantages , foreign industries produced a dual effect of demonstrating and squeezing China's domestic industries. These demonstrations and squeeze effects had been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a's industry before the Sino – Japanese War.

Gender Analysis of Youth Associations and Media in Tianji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LI Jing – f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 and it is also a special period of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 the youth associations in Tianji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express their own demands for social change , and profoundly reconsidered the anti – 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ir social imag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male and female members of these associations had modern gender awareness. Through media , they have made efforts to reform the gender system , reshape the gender culture from multiple levels , and integrate the ideal for modern countries and gender equality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 ethnicities and strata. Changes in gender relations and women's perception of themselves and society precisely revealed the interweaving and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ctors as well as their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Subtle Practice: From the Narrative of Bottom – level to the Writing by the Masses

SHA Yao; SUN Yu

(1.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21;*

2. *School of Marxism ,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ome news reports today tend to incorporate the expression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to the narrative of bottom – level , but the concept of " bottom level " cannot explain the master statu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socialist China , and the research on bottom – level follows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of " bottom school " created in the context of post – colonialism in India. With the case of the explosion of Fan Yusu in the network , 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path and possibility of the narrativ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Saying farewell to the narrative of bottom – level and returning to the writing by masses can be said to be the return to the " mass line " in practice and the Marxism theoretically.

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Mass Culture

——A Study on the Outing Report of China Pictorial and Its Symbolic Mechanism in the 1950s

LIANG Jun – j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Outing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mass culture in Chinese cities after 1949. In the photographic reports on outings of China Pictorial in the 1950s , the youth groups on the outing camps were shaped as the socialist new generation , who practiced a modern healthy lifestyle in the " hometown " . At the same time , they also became reserves who were " ready to " involve in and buil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 photographic images selected and amplified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the mass culture , passing the socialistic aesthetics and lifestyles that can be witnessed by a few urban residents to the wider classes and groups through images. The mass culture also responded to the basic tasks in the field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 which was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modernization of New China in level of double meanings.